

N

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

NATIONALISM

中央编译出版社

民族主义

[英]

埃里·凯杜里 著

张明明 译





NATIONALISM

中央编译出版社

民族主义

[英]

埃里·凯杜里 著

张明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主义/(英)凯杜里著;张明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

ISBN 7-80109-526-X

I. 民… II. ①凯… ②张…

III. 民族主义-研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714 号

民族主义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cctp. edit@ sina. com

h t t p: // www. cctp. com. 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15 千字

印 张:6.125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1.80 元

全球化、现代化与 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

——《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代序言

徐波 陈林

—

人类已经在期望和不安中步履踉跄地进入了 21 世纪。在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时，民族主义无疑是一个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话题。它从历史深处顽强而莽撞地走来，在 20 世纪形成蔚为壮观的历史画卷，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世纪之末又出现一次引人注目的勃兴。苏东剧变之后的几年间，至少有 20 个新的国家出现在原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土地上，每个新国家都声称代表着在原帝国或联盟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民族（但每个新国家都仍然是多民族国家，这是民族主义历史上一再重复的现象）。在库尔德地区、在巴尔干、在车臣，在爱尔

兰、魁北克、巴斯克，在中东、非洲、南亚、中亚和其他地方，为民族主义理想而进行的斗争到处存在；不同的民族社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到处可见。与民族主义有关的事态导致了世纪末几场最大规模的战争：海湾战争、波黑内战、两次车臣战争和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正如有人所说：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间，民族主义不但没有消亡的迹象，反而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广泛和最强劲的发展。^[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如果不对“民族”这个字眼以及由它派生的有关词汇有所了解，简直就无法对人类最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作出理解。那么，民族主义是什么？几十年来，政治家和学者们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不知凡几，但没有一个定义能为人们普遍接受，因为没有一种解释能够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民族主义的所有特征和内容。即使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埃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的定义(“……一言以蔽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体[nationality]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在一个国度里，族体的疆界不得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2])，也因其显而易见的缺陷而仍然不能使人满意。有人说，民族主义是只大象，每个研究者摸到的都只是它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19世纪的政论家白哲特(Walter Bagehot)在谈到“民族是什么”时讲道：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要马上对它作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对民族主义来说，白哲特的话同样适用。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和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认为，这是

因为,首先,民族主义现象所涵盖的范围是广泛的和多侧面的,它包括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发展,也包括族裔特性和社群的发展。它延伸到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领域:种族和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语言发展、政治宗教、部派主义(communalism)、族裔(ethnic)冲突、国际法、保护主义、少数民族、性别、移民、种族屠杀。民族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也如同一个万花筒:宗教的、保守的、自由的、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文化的、政治的、保护主义的、整合主义的、分立主义的、领土收复主义的、散居民族的、“泛”式的等等。民族感情、民族抱负、民族文化价值的流动性和多样性又为系统的研究设置了另一个障碍,民族特性的众多差异也是如此。其次,民族主义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它需要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地区经济学家、国际法学家等从各个角度进行的努力。民族特性的内容和潜在的原因都具有多样性,仅此一点,任何学科的学者的研究工作,都只能涉及这一课题的少数方面和少数事例。

无论如何,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尽管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洲更早的历史时期,但人们普遍认为,它的正式形成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其标志性事件是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的发表(有人认为,还应包括1775年波兰的第一次瓜分)。美国独立战争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意识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爆发。《独立宣言》是体现民族主义原则的最早文献之一。美国开国元勋们还希望

美国革命所体现的民族和民主原则传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托马斯·杰佛逊在《独立宣言》诞生半个世纪后的1826年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它将在全世界燃起独立运动的火花，“成为唤起人们摆脱锁链的信号”。^[3]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各地乡间庄严地“在上天之前宣誓”放弃各省之间的分歧，“为保卫国家贡献我们的赤诚和武器……和衷共济，迅速去支援在争取自由的事业中可能处于危难之中的巴黎或法国其他城市的我们的兄弟”。^[4]1792年间，当国民议会几乎全体一致地决定对奥地利宣战时，当国民议会庄严宣布“祖国在危急中”时，“整个法国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振奋……各区、市、各民众团体纷纷写了请愿书；有的人招募军队，有的人自愿捐献，有的人制造长矛，全国好象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者进攻欧洲。”“整个法国只要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要反对抗战就被看作对祖国不忠、对祖国的神圣事业不忠的罪人。”^[5]

这种情景在以前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它正是民族主义喷薄而出的生动体现。有学者指出，美欧革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的情感和思想内容却越来越多地是民族主义的，它们的结果导致了从专制主义国家到群众性民族国家的剧烈转变。1792年后，法国革命与它的三色旗、马赛曲、集会、誓言、游行、仪式等等，开始将它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到整个欧洲，在这一点上，拿破仑的征服和它在英国、西班牙、德国、波兰和俄国引起的强烈抵抗，在整个欧洲强化并传播了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个性的公民观念并延及拉丁美洲。历史学家指出：“在其初始之际，民族主

义打碎了传统的、陈腐过时而束缚人的社会秩序,并以人类的尊严感、以参与历史和管理自己事务的骄傲和满足感填充着追随者的心灵。这种使人获得解放的感情正是19世纪欧洲早期民族主义的特征,正如今天(20世纪中期)在亚洲和非洲一样。”^[6]

维也纳体系使欧洲退回了“民族主义以前的时代”。但就在维也纳体系时代,民族主义在欧洲及欧洲控制的殖民地继续坚韧地生长着。“1789年的两大遗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到处传播,而“民族主义又比自由主义更为强烈”。^[7]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民族主义意识的第一批表述者和思想家,例如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和阿恩特(Ernest Moritz Arndt),例如费希特、赫尔德、施莱尔马歇,例如希腊独立运动的精神导师科拉伊斯(A. Korais)和“青年意大利”运动的领袖马志尼,也许还有黑格尔——他在精神上继承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世界主义情怀,但民族主义哲学和理论也在他的国家学说中得到了表达。而在欧洲的殖民地拉丁美洲,则出现了波澜壮阔并成效卓著的独立运动。到1848年几乎席卷欧洲各个角落的革命猛烈爆发的时候,民族主义已表现为遍及各个民族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在此时已经具有了全欧洲的意义。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无疑是民族主义原则在19世纪中期取得的最大成果;而在19世纪后半期,与自由主义相联系的民族运动的重心转向了东欧和东南欧处在哈布斯堡帝国、沙皇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内备受压迫的各个少数民族,尤其是巴尔干各民族当中。从1878年到1912年,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门的内哥

罗(黑山)、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相继获得独立。进入 20 世纪,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要求冲破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边界而汇合到了一起,刚刚获得国家身份的各民族彼此之间的争斗也趋白热化,这个地区由此成为引发多次国际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和东南欧才得以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而到 20 世纪末期,这些民族国家又在民族主义的勃兴中在更细致的民族基础上进行了重组。

二

正是在 1848 年革命的前夕,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言》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时描述了这样的景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中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8]

人们看到,《宣言》的论述不但完全符合 19 世纪中期以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状况,而且在直至今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验证。《宣言》所描述的这种景象就是人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现象,如果我们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这个过程从资本主义迈出向全球扩展的第一步的时候就已开始。

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正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即 19 世纪中后期之后,与全球化进程似乎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全世界日益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甚至在一个多世纪中左右了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那么,《宣言》中的上述论述出现了自相矛盾现象吗?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发生了脱节和背离吗?资本主义发展的国际性和全球性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至少从第二国际时期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人们对上述论述的理解就产生了重大歧异。今天的人们在研究民族主义现象时也会时时产生同样的困惑。

我们看到,在《宣言》中,几乎紧接着上述论述,还有这样一段同样重要的话:“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9]

对于这段话,人们一般都会正确地理解为描述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它描述的是欧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old-established nations)或“历史性国家”(historic nations)的情景。但是,从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描述的也就是民族国家形成或建立的过程。它描述的是传统的“历史性国家”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而 19 世纪

中期以后 100 多年的历史表明,对于首先出现在中欧、东南欧和东欧,随后出现在亚非拉各地,出现在全世界的新的民族国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段论述同样适用,表现出卓越的预见性。

换句话说,《宣言》为我们描述了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用现在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化的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加强。

列宁用更直接更明确的语言表述了同样的意思。在经历了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浪潮的迅猛发展后,1913 年,他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这样写道:“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10]列宁并认为,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主导地位,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我们理解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我们不妨沿着以下思路来思考问题。

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确实使空前的国际联系和交往拥有了坚实的基础。全世界各个民族彼此建立起非常紧密的联系,一个庞大的国际市场建立起来,资本、技术、原料、产品、劳务、信息和观念都在这个市场上流通运转。过

去那种地方性的自我孤立和自给自足状态的樊篱被最终打破。但是,它的结果却是多方面的。它打破了地方的樊篱,却没有打破民族之间的壁垒。它所产生的后果虽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但它的意义首先作用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工业革命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英国)之内开始的,它的传播又是以一个个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形成世界规模的。19世纪中期以后,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取代国家重商主义成为主要国家的经济指导思想,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确立。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但生产的组织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不管企业具有何等规模的国际联系和超国界的发展,它的母体仍然处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它的存在、经营和发展受到本国法律、文化和传统的约束和支配。国际卡特尔所布下的“看不见的大网”,虽然把不同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但它的目的却是为自身的利益,从而也是为自己的“祖国”服务的,而且并不能阻止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产品的国际流通扩大了,但国内消费的增长更加迅速。工业资本主义的血液——货币、信贷和银行业,虽然具有极强的国际性,但它们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并且首先是被用于本国之内。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化,非但未能消除民族国家之内的壁垒,而且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母体,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一个合法结构和中介,并在国际竞争中充当了本国经济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强化了经济对民族国家的依赖。

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扩大,为民族主义的传播适时提

供了温床。难以计数的大批农民离开乡村涌进城市,扩大了民族主义潜在支持者的队伍。教育的普及和科学观念的推广造成对传统信仰的怀疑,心灵的依附和精神的寄托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不复存在,这就为民族主义的传播恰到好处地留出一个空间。由国家实施和指导的全民教育,自然把爱国主义和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摆在同“基本三会”(读、写、算)同样基本的地位。工业、交通和通讯的革命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民族主义的宣传和传播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和跨国的旅行变得廉价而便利。国内的旅行和迁徙使人们对自己的同胞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交往,加强了同族同种的认同感和亲近感,对“祖国”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而在国外的见闻则使人们看到“自己”与“他者”的区别。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更使这种情况得到加强。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浪潮以一种难以估计的程度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增长和传播。国内的移居进一步打破了国内各地区的界限而对本民族进行了一次整合;移居国外的人们,要么与其他民族的移民共同组合成为新的民族,要么在当地民族中间形成特殊的聚居地并形成特殊的民族观念;接受移民的国家要么成为形成新民族的“熔炉”,要么产生拒斥外来移民的情绪,甚至出现当地居民与移民的对立。

由国家制定、实施和支持的社会福利、法律和教育等制度,也是促使欧洲各国人民普遍接受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国家里,人们的生老病死、上学求职、一切公私事务,都离不开民族国家建立的种种组织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

下,还有什么能够比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忠诚还要强烈的感情呢?还有什么能比民族感情更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填补人们的心灵呢?

安东尼·吉登斯将民族国家称作一种“权力集装箱”(power - container)。^[11]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他的这个概念。民族国家牢固地主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民族主义牢固地控制了欧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民族”与“国家”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民族第一”与“国家至上”观念深深融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在已经建立民族国家的地方,民族主义表现为对“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的坚决伸张和维护;在其他一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就成为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正反映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12],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

三

时间又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在目前这个新的世纪之交,全球化进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世界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资本、商品和劳务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在国与国和洲与洲之间自由流动,并且更加轻易地绕过国家的边界壁垒,传统的国家主权和边界概念似乎正在消解。空前

扩张的大众传播技术将各个地区的各种人群纳入一张大网,使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更加趋同。

如何理解在这种形势下再度爆发的民族主义浪潮?人们对民族主义的功能、趋势和结局进行了各种分析。有人认为,“民族”已经失去了以前的经济功能,民族主义在这样一个现代性和全球性的世界上注定将要消失。世界历史发展的首要力量是大型跨国公司、大国集团和覆盖全球的大众通讯系统。财政预算庞大、人员训练有素、投资量大、市场广阔、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载体。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则将处于次要地位,并被相对化。霍布斯鲍姆认为,从总体上看,全球性的相互依存意味着更大的经济单位将来会提供一种人们共同体的基础,20世纪末期的民族主义已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再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纲领。目前重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只是对20世纪很多地方过分强调非民族与非民族主义原则的回应,不能为21世纪世界政治重构提供新的原则。实际上,在考察20世纪末期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浪潮时,人们看到,民族主义现象大都发生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即原苏联地区和第三世界。20世纪末期的世界在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倾向——仍然是列宁描述的“两种历史趋势”。

一种趋势是由欧盟体现的。尽管欧盟在其内部建设中困难重重,矛盾不断,正如人们所说,建构一个超民族的共同体、形成统一的欧洲认同是如此之难。但欧盟无疑体现着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概念的超越。国内有的学

者把欧盟描述为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集体民族主义”或“区域民族主义”),这也许是基于对欧盟(欧共体)的成立背景及早期情况的考察,当时它东抗苏联集团挑战,西拒美国控制的企图,要在“两超”的夹缝中确立欧洲的地位。以现在欧盟情况来看,尽管它与美国贸易摩擦接连不断并几度白热化,但这些都只是一般的经济意义上的摩擦,对双方来说都不具民族主义内容。而欧盟的内部建设,意味着人们正在企图克服民族主义给欧洲带来的弊病,“结束上千年来存在于欧洲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与争斗以及民族主义的战争”,通过一体化而使欧洲享有和平、繁荣和幸福。

但是,尽管如此,也许我们要和安东尼·史密斯一起发问:我们能够真正接受一个没有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世界吗?民族国家情愿地将自己的权力拱手让给一些全洲性的或全球性的组织,让它们成为人们效忠和情感寄托的对象,这会是可能的事情吗?^[13]

实际上,我们看到,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际竞争也更加激烈,而国家(政府)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加强。美、日、欧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拥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它们的政府千方百计为自己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和生存空间,为此不惜利用优势向他国施加压力;它们大力促使本国企业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极力保护本国市场,保护本国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并积极调整国内法律法规,以加强本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但国家作为资源调节和分配、作为国际比较的基本单位的作用没

有改变。

史密斯则从另一方面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认为,电子通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无疑促进了更广泛的区域性—全洲性网络的建立,但需要探究的是这种联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至高无上的文化和认同,来与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相互竞争并取代它们。欧洲的商业、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努力领导联盟的建设,但大众文化则相对滞后。许多国家的人们对欧盟建设和加入欧盟精明计算,表明欧洲各民族之间缺少一种深厚的情感或文化上的连结。就文化、价值、理想和传统而言,人们对于“欧洲”代表什么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理想,也没有任何一种属于欧洲大家庭的强烈感觉。欧洲找不到像过去的基督教那样的共同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找不到共同的记忆与象征、神话与传统来唤起欧洲居民像对民族国家那样的忠诚。因此,欧盟的实践能否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指出通向新世纪之路,它是否只是民族国家概念的进一步扩大化,目前至少仍然无法看清。

另一种趋势就是民族主义的浪潮。人们已经看到,这次民族主义浪潮所要解决的,大都是在历史上曾经提出过、但未获解决的问题,它们长期以来为众多其他因素所压制或掩盖,只是在20世纪末期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被激发出来。这个新的历史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波。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人们已作了各种探讨。人们公认,经济的失败是根本的因素。这种失败不但使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民族融合”的愿望落空,还(与其他因素一起)加剧了少数民族对主要民族的离心倾向。